

# “中体西用”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陈 铁 军

(安庆师范学院 历史系,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 要: “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冲突的产物,是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较成功地指导了早期工业化运动,也是政治变革的先声。“中体西用”思想为文化、教育、思维观念近代化创造了契机,促使了持续变革开放机制的形成

关键词: 中体西用;洋务运动;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4730(1999)04- 0037- 40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作为转型社会的一种文化模式,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冲突的产物,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鸦片战争前后严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构成了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成为刺激着清醒的爱国者寻求自强御侮之道的直接导因。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体西用”思想应运而生。

冯桂芬在 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sup>①</sup>这可视为“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到了七八十年代,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对“中体西用”的表述便较为完整、直接了,所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sup>②</sup>、“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sup>③</sup>、“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sup>④</sup>、“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sup>⑤</sup>在这里,“中学”的地位、“西学”的作用,被最易于理解的传统观念与语言予以确定,并开始发挥其在近代史上的长久影响。

无疑,“中体西用”思想不是完美的,然而,它是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中体西用的最早倡导者大都是近代有见的知识分子。它的提出针对的就是当时最为紧迫的强国与御侮任务,而后者更为重要,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中体西用”正是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提出的第一个治世方略,有着无可怀疑的历史进步性。

首先,“中体西用”意味着对自身落后的承认和对西学的朦胧向往。它冲破了“华夏中心观”的思想桎梏,默默承认了“中学”并不是完美的,而是有所不足;“西学”并非一无是处,它自有超出“中学”的地方。这就从精神上认可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成为近代对自身及世界新认识的起点。其次,“师夷”之目的,在于“制夷”。西方文明首先是以“长技”形式为中国所了解,因中国缺乏“船坚炮利”之“长技”所以落败,因此,尽学“西夷”之长技为我之长技,既可“卫体”又可“御侮”,终为我用,这一目的与愿望显然是合理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以“制夷”为目的而倡导的“西学为用”,正顺应和暗合了近代反侵略和实现自身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人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达到“制夷”、“求强”、“求富”的目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由此兴起。再次,“中体西用”思想表达了对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初步认识。一方面,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它坚持纲常

\* 收稿日期: 1999- 01- 09

名教的前提性地位,同时又朦胧地感受到西方之利弊;倡其优,摈其劣,并与中华文明相触,以“中体西用”界定,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和功用,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充分抚慰了处于剧变中的中国人在情感上的失落感和疏离感,因而态度是谨慎的。另一方面,它以“本末”、“体用”和“主辅”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精神难能可贵,态度无疑是积极的。

“中体西用”思想主要的并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一个对现实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的实践问题,主要就在于它成功地指导了早期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使“中体西用”完成了从思想认识到政府行为而产生实践价值的过渡。可以说,没有“中体西用”作为思想先导,就不会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近代化的起步。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整整一代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借取西洋新法,将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引到了中国,实现了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使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近代工业文明的曙光。洋务运动在引进生产力的同时,还不自觉地带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培育了第一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建立了远东第一吨位的海军舰队,这一切都是“中体西用”思想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没有“中体西用”,就没有这一切。固然,洋务派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历史进程的按键一经触动,就由不得他们自己了,而是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与法则向前运行,一个个新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相继诞生,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终于出现。

## 二

近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历史进程。“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sup>⑥</sup>伴随着经济的工业化,政治、文化、人的价值观念等势必都要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于是,洋务时期因引入西方器用而衍生出的持续变革就逐渐扩大及“制”的层面,不过,导入形式仍然是“中体西用”式的语言。

“中体西用”是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共同推崇的准则。早期改良派中,有人脱胎于洋务派,承继并发展了“中体西用”思想,其内涵已有很大变化。一般说来,洋务派官僚大多是“强兵治国”论者,他们虽要求变通“祖宗之法”,但范围极其狭窄,只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不学习西方的“文物制度”;只着力于对外“强兵”,而不注意“内修国政”。而早期改良派继承和发展了林、魏等人的民本思想,并将其置于“以工商立国”的商本论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的重民思想,强调以政治改革为本,以内治为本,学习西方的“君民共主”,比洋务派更开明。

七十年代中后期,王韬、郑观应先后发出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吁,要求仿行泰西各国“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之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的“良法”<sup>⑦</sup>,这是近代中国君主立宪思想的发萌。到1880—1881年间,游历欧洲归来的钟天纬,更明确地认为,欧洲各国日臻富强的本原在于“通民情、参民政”。他说:“盖泰西通例,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不能威权自恣。”“乃中国事事与之相反……国势安得不弱?”“而欲矫其弊,振其衰,固非大有更张不可”。他还赞赏西国“小民皆有自主之权”,说:“君者,民之所拥戴,而非天之所授权……是以亿兆定律法授君遵办”,“如有非法自恣者,兆民拒之,不得谓之叛逆。”<sup>⑧</sup>

中法战争后,主张设议院的声浪日高。1886年,格致书院肄业的王佐才主张用“改内阁为公议院”等办法作为“将来仿照西国议院”的过渡,并参照西方“律法”改良中国政治,逐渐实现代议制。80年代的最后几年,日本接连实行内阁制,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对中国形成一种政治冲击波。到90年代初,早期改良派主要人物都明确认定“变法自强”要以“设议院”为“本”。王韬说:“泰西议院之设,亦与中国皇古之道暗相吻合,故中国设此足立富强之本。”<sup>⑨</sup>陈炽也认为:英德“合君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是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sup>⑩</sup>早在甲午战前,郑观应已认为设立议院“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混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战后进一步提出,西方国家的富强“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sup>⑪</sup>。马建忠认识到西制是西学之本,西方国家之强盛在于“议院立而下情可达”,而“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他还进一步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三权分立制,认为:西方“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

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sup>⑧</sup>。有趣的是,洋务派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当中极少数有头脑的官员也认识到有借鉴西方政治的必要。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临终前认识到“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是“西人立国”“驯致富强”的根本。<sup>⑨</sup>另如郭嵩焘等人,也发表过西方富强“自有本来”的看法,对西方政治制度表示某种赞赏。<sup>⑩</sup>

从王韬到郑观应及至郭嵩焘、张树声,其体用观中已经引入了“西体”——“议院”,而“议院”是一种政治制度,这实际上已涉及到近代化的较深层面,即政治近代化。它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有了民权思想,虽然这种思想还很脆弱。尽管如此,他们主张将中国由“一人秉权于上”的“君主之国”变成“君民共主之国”,实际上就是提出了用民主制度取代君主制度的变革任务,从而为中国政治民主化走出了第一步,具有实质性的思想变革价值。

### 三

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交流和变异,任何形式的思想文化当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时,都是以本民族文化的特征为主体,吸收外来文化的养份,注入新的生命力,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综观“中体西用”思想三十多年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它反映了当时中西思想文化交融结合的动态过程,其中已包涵了新的思想文化内容,从而为早期文化教育近代化创造了契机。

“中体西用”作为向西方学习引进西学的指导思想,开始虽然强调维护传统纲常名教,把西学附会于中学之下,但却以和缓渐进的方式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有首创之功。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洋务派则采取了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并认为这种功利性并不与自己所坚持的那套体制和深层意识形态有什么矛盾。左宗棠以为中西二学虽有“虚”、“实”分别,但同时指出二者“各是其是,两不相逾”,并进一步肯定西学的器用价值,“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最后得出结论是“中不如西,学西可也”<sup>⑪</sup>;而李鸿章则更进一步强调二者的互补性,认为中国的封建礼教制度虽为“郅治保邦”之本,但学习外国武器和科学技术则是“保本”的“治标”手段;张之洞则本着“二者不可偏废”的思路,在《劝学篇》中虽以内篇阐述中学问题,宣传他的“务本以正人心”的观点,但同时以外篇阐述西学问题,宣传他的“务通以开风气”的思想。所以,从积极意义上讲,“中体西用”思想论及了中西文化的可融性和共同性、特殊性及其差异性。它把中国的文化教育视为主体硬件,而将西方文化作为必不可少的软件材料,以此改换旧学体系中不适应王朝统治的成分,这虽在理论上充满着矛盾,但将它作为清末统治思想,不仅冲破了封建顽固派视为至尚的“旧学”樊篱,而且有效地指导了官方政策的修订,对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同时在抵制全盘西化方面,又表现出了其难能可贵的、具有本民族文化特点的进步作用,有效地确保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中体西用”观中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思想最终促使洋务派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进行某些改革。特别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传播西方文化方面,对知识界起了启蒙教育作用,更重要的是为近代实业教育的实施创造了契机。清政府于 1872 年分批派遣幼童赴欧美留学,如严复、詹天佑都是这一时期派出学成归国的著名人物,这些经过西学濡染的人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在“中体西用”宗旨下,清政府还在 1865 年以后设立了军事、工艺、医学和外语各科新式学校,培养了一批适应时代要求,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知识的近代适用人才。在各级各类学堂中,西学课程及课时也有逐年增加之趋势。显然已具有“西主中辅”的特点。大量西学课程的设置,无疑突破了科举仕途的唯一性,也就必然动摇传统文化教育的正宗地位,最终促使科举制于 1905 年的废除。在教育理论与制度上,孙家鼐、盛宣怀等人将“中体西用”正式作为办学的教育思想。孙家鼐在接受光绪诏命筹备京师大学堂时,即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sup>⑫</sup>的办学方针。值得一提的是,“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癸卯(1903 年)学制,绝非偶然,正表明“中体西用”在文化教育近代化上所起的促进作用。

随着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开放,社会心理、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在悄悄地变易。由于西学以一种高一层次的科学文化长驱直入,在士大夫中间造成激烈思想震荡,引起人们对传统人文精神的重新思考,近代人文

精神开始孕育;人们超越几千年的封闭和内求,开始以整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和国家的存亡;摈弃以祖宗成法、圣人经典来衡量得失是非的传统,崇尚和参予社会的变革创新;从近代科学所提供的思想材料、思维方法入手,融合个人利益与社会道义,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崇古薄今等传统价值观念受到挑战,重商、重利、务实等观念开始萌生,并受到时人的尊崇;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传统的礼俗也发生适应性的变革和调整;趋新力量的增强,促使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观呈现出多元走向,新生活方式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这些,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转变人们的思维观念,加快社会变革的步伐,都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作为过渡时代的一种过渡型文化理论,“中体西用”说的出现,证实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华民族的开明人士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是附丽于种种现实的,甚至是十分保守的政治目的之下,但它到底为古老的中华走向近代化提供了一种初级模式和一级认识阶梯。然而,任何文化体系都是具有整体性的,“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了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sup>①</sup>洋务派的文化行为亦同样如此,“他们引以‘中学未备者’的‘西学’恰恰成为中国前现代社会走向整体性溃败的酵母”<sup>②</sup>,他们为护卫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而进行的“采西学,制洋器”的活动则在中国前现代社会内部形成一个持续变革开放的机制,从而开始了“艺(器物)——政(政制)——教(文化)”近代化时序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中体”的内涵不断紧缩,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整体性发生溃败,近代化进程步步向纵深推进。

① 冯桂芬.校庐抗议[M].戊戌变法[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8.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M].9.

③ 薛福成.筹洋刍议[M].

④ 王韬.园文录外编[M].323.

⑤ ①② 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

⑦ 王韬.园文录外编.重民下[M].郑观应.易言.论议政[M].

⑧ 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65.

⑨ 刘学照.论洋务思潮[J].历史研究,1986.3.

⑩ 陈炽.庸书外编.议院[M].

⑪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M].北京:中华书局,1960.31.

⑫ 洋务运动:卷1[C].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42.

⑬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C];书牒.卷17[C].

⑭ 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C].17.

⑮ 汤因比.文化经受着考验[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80.

⑯ 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147.

责任编辑 徐希军